

实验能否重复 争论仍在持续

谁来给韩春雨事件画上句号？

近日，国内外20名学者联名撰写的一篇名为《有关NgAgo的问题》的学术论文在《蛋白质与细胞》杂志上发表。这是首次公开发表、专门针对无法重复韩春雨NgAgo实验的学术论文。16日，韩春雨回应，科学论文会用科学论文回应，将发表近期实验结果，不过他随即补充，论文不会马上发表。

韩春雨事件曾经一度是热点，无论是最初引发轰动的“诺奖级成果”，还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批评和质疑，问题起码始终处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。可现在随着相关媒体的深入报道，纯粹的一场科学实验逐渐同高校、团队、商业机构等各方利益牵连起来，事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。

是时候给韩春雨事件画上句号了。该由谁来画呢？按理说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韩春雨本人。可惜，他却总是习惯自食其言。在此之前，韩春雨曾表示，愿意

与对实验抱有怀疑态度的专家、学者面对面讨论。为此，不少国内外实验室派出实习生，希望现场观摩韩春雨团队屡屡提及的“卓越的实验技能”。但是，实习生们无一例外被排除在基因编辑实验之外，希图其本人道出真相已不大可能。异样的是，韩春雨团队的其他成员同样三缄其口，并有意无意地回避多次国际会议。

我们也曾一度将希望寄托在其他科学家身上，可从最初国外实验室抱怨无法重复结果，到现在国内外科学家联名质疑，对话非但没打开，反而陷入了更为尴尬的自说自话的境地：同行们的实验不断失败，韩春雨团队私密进行的实验却接二连三取得成功。要使双方交流有效，彼此坦诚、无所隐瞒是必要前提，若韩春雨团队始终采取如此敷衍了事的态度，显然永远别指望能就此画上句号。我们也曾希望法律能够成为终结事件的

有力武器，毕竟韩春雨团队屡屡强调自己的成果已为某些商业机构采用，我们完全可以从该商业机构着手调查，因为在实验成果存疑的情况下，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商业风险。然而，韩春雨团队对合作机构的名字讳莫如深、不吐一言。

根据我国现下的学术体制，最适合澄清事实、展开调查的是韩春雨团队所属单位河北科技大学，可高校学术委员会同样屡屡食言，早已丧失公信力。究竟该由谁来为事件画上句号，由事件进展可推知，我国科研共同体缺乏应对这种情况的有效经验、国家相关部门同样因缺乏法律授权而不得介入。如何防止“后来者”模仿此类行径，从而危及科研成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、甚至危害国家声誉等，这些问题均刻不容缓有待解决。

《南方日报》2016.11.18文/路中林

由于推广、营销和交易等环节能够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，从而脱离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微商在近几年发展势头很是不错。然而，在发展过程中，除了假货次品频出等问题，一些商家的运作模式也使得微商成为违法行为的滋生之地，如微商传销。

别让“微传销”透支社会信任

如果不考虑其他，有时候真不得不“佩服”那些传销组织者，他们身兼心理学家、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演说家、心灵鸡汤烹调高手，能将一根稻草传成黄金。只要你进入他们精心营造的那个“场”，总会有一些弱点被他们抓住，总有一些励志故事把你打动，直至你被“俘获”之后才幡然醒悟，过去几十年白活了。

微商时代，他们纷纷转移阵地，搭上这班快车。微商本来就在朋友圈里做生意，熟人半熟人买卖，正好与杀熟的传销伎俩暗合。经过一番涂脂抹粉之后，传销借微商还魂了。与传统相比，寄生在网络之上的“微传销”愈加便捷，连相互见面环节都可以省掉。效率是高了，破坏力也更大，误入“微传销”深处，连被谁诓了都不知道。更令人反感的是，“微传销”伤害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，透支了社会信任，破坏了公序良俗。

对传销这种非法活动必须采取“零容忍”，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。打击传销，监管部门是第一责任人。外部监管要打提前量，不要采取传统的“民不举官不究”，尽量主动介入，将关口往前移。

在防范上，互联网企业发现传销迹象，可以将信息与管理部门共享，协同打击。打击“微传销”，公众也有责任，不参与也要敢举报，别碍于朋友情面。

《广州日报》2016.11.17文/连海平

机器人养老好

亲情不能少

《我，机器人》等关于人工智能的影片里的场景，正在现实生活中初露端倪。今年5月，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引进了一批智能养老机器人——“阿铁”。“阿铁”是为养老服务量身定做的，目前还处在试用阶段。

澎湃新闻上传了一段老人和“阿铁”互动的视频。可以看到，这台机器人还不够“智能化”，其实就是把一些功能集成在一起，比如唱歌、对话、语音提醒等。就这些功能，表现也不够出色。比如老人说：“阿铁，我非常喜欢你！”“阿铁”的回答却是：“主人，请你说中国话。”而实际上，老人的话虽然有点口音，却还是让人听得明白的普通话。这说明，这部机器的语音识别技术仍然有限。

今年4月，工信部、发改委等联合印

发了《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，按照这份规划，机器人在5年内将走入养老服务。规划提到，要大力推进服务机器人在医疗、助老助残、康复等领域的推广应用，满足老人的部分治疗、生活与精神需求。

不过，即便今后机器人在养老产业得到广泛应用，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的作用。机器人毕竟不是人，老人需要的也不光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情感的机器。无论选择何种养老模式，老人都需要子女的亲情关怀，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。不妨设想，当我们老了，可陪伴着你的，却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，这该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事情。

发展智能养老机器人，严格来讲与选择何种养老模式并不冲突。这里担心



一名老人通过智能养老机器人“阿铁”与家属视频通话

的是，随着智能机器人越来越广泛运用，子女会更加有赖于这一人工智能辅助手段。有人可能还会因此感到“解放”了。所以，当看到这一则消息，忍不住要“杞人忧天”，提前发一通感慨。人总归是情感动物，不能被机器所奴役，更不能让机器完全取代作为子女的责任。

《钱江晚报》2016.11.17文/魏英杰

单身是人生的自由选择

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二孩的调整，间隔了将近40年。40年后才开始扭转的问题，不可能立竿见影，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思索得过于简单了。它是中国社会进程从未出现的新问题，出乎意料之余应当反思的是，我们对高生育高养育高教育的困厄估计不足，许多人生不起养不起陪伴不起伺候不起，才导致了今天不升反降的尴尬。

今天的专家又把出生率的降低，归结到单身潮的来袭。单身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是多少发达国家的经历与曾经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，而当代女性的经济独立、精神独立使得她们在传统婚姻上展现了别样的意识与觉醒。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一种人生选择——包括男性，我们大可不必过度渲染不婚不育，会遭遇乳腺癌、抑郁症、心脏病、寿命短的危险，以此科普单身一族。这种危言耸听的催婚催育不但会催生出婚姻的畸形与变态，更容易制造胎儿的生理畸形——速生速育坍塌了优生优育，有百弊而无一利，不人道也反科学。

对于国家而言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，要从政策、经济、教育、福利等诸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优待宽松与实惠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《北京晨报》2016.11.17文/魏润身

应给职业打假人一定合法空间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（送审稿）》11月15日起向社会征求意见。送审稿强调，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；以牟利为目的购买、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。这意味着近年来方兴未艾的“职业打假人”或将难以得到新消法保护。

职业打假人扮演着假冒伪劣商品“发现者”角色，对市场上的制假售假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，但是其中有些人的打假行为只为逐利，这种动机难以令人肃然起敬。为了索取高额赔偿，只买“假”的不买“真”的，只买

“贵”的不买“对”的，特别是一些职业打假人受利益驱使，将打假空间无限放大，甚至游走于法律边缘。这种扭曲的消费心态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同。在此语境下，新消法将对职业打假人说“不”，也是一种必然。

然而职业打假人又是一股有一定正能量的共治力量。目前我国的市场监管能力还比较薄弱，与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需求之间形成矛盾。职业打假人以更加职业、更加专注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力量去监督生产者和经营者，既能够倒逼市场机制的净化，又可以促使监管部门更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，我们也应给予职业打

假人一定的合法空间以及社会道义上的理解。

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需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引导、有效规范和制约。职业打假人在主张权利时，过分地冲击市场秩序和社会风尚，对此需要进行遏制；职业打假人在有效行使法律赋予的社会共治权利的同时，也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承担起维护权利、主张利益的责任。换言之，职业打假人自身也要理性地、自觉地接受法律的规制，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维护权利的时候，肩负起促进公共福祉、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使命。

《济南日报》2016.11.18文/汪昌莲

贫困生隐私与公正透明不矛盾

近日，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坚持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，精准识别对象。其中，评议认定不得要求申请认定学生在公开场合陈述申请理由。

在大学做过班级工作的人都知道，评定贫困生、分配助学金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。其难度在于：其一、获助学金者名额有限；其二、评定难度大，对评定流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有较高要求，若不能妥善处理，容易产生“猫儿腻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以往的评定流程

里，申请助学金者的公开自我陈述是关键环节，有的同学碍于面子，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想公开贫困身份。而公开陈述个人情况的同学，把一些痛苦、不幸的隐私暴露，无异于“二次伤害”，甚至有人利用评定者的同情心，过度渲染、夸张穷困，把评定会搞成了“比惨大会”“哭穷大会”。

因此，在维护评定公正和透明的同时，还要保护贫困生的个人隐私和尊严，这就需要一些具体的、灵活的操作办法。

对贫困生的经济资助，早就有国家政策层面的确认和支持。只是在政策的落实中，容易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

策”，有的是“好心办坏事”，有的是有意侵吞国家福利。对于前者，应以合适的评定流程加以引导；对于后者，必须及时遏制，若有情节严重者，还应诉诸法律。更科学、公平的方法、流程，是遏制评定中“猫儿腻”的最好办法。

助学金少则几百元，多则几千元，看似不是个大数目。但此事不可小视，保护贫困生的隐私和利益不受侵害，是彰显大学教育理念的途径之一。通过校园里的点滴关怀，尤其是细节上的人性化操作，会让贫困生感到未来生活的希望。毕竟，爱的教育比其他冗长的说教更有价值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2016.11.17文/黄帅